

■馆藏拾粹

镜如其铭

一份来自2000年前的新年问候

李潇

百年节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之一。春节的到来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更新草木复苏。春节期间，人们常会除旧迎新、祈福求愿，与亲朋好友互发新年祝福，期盼新的一年诸事顺遂。汉代铜镜铭文中有不少祝福吉祥语，正适合庆春纳福，表达美好祝愿。

大乐富贵

“大乐富贵”四叶蟠螭纹镜(图1)年代西汉，1956年长沙燕子咀三号墓出土。直径18.6厘米，重445克，铭文：“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

汉代社会崇尚荣华富贵，对富贵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是当时社会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富贵”是汉代人毫不掩饰的一种人生追求，汉代休养生息的政策促使当时人们的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刺激了汉人博取富贵与显示富贵的心理诉求。在文献中有着大量关于汉人渴求富贵而厌弃贫困的记载，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等。“大乐”即极大的快乐。《二程语录》卷二：“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经过汉初的大乱，由文帝始，天下太平，人们追求“大乐富贵”，并期盼着这种富贵的人生能够更为长久(即千秋万岁)。“宜酒食”三字在西汉铭文镜中用的比较广泛，《诗·唐风·山有枢》：“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既有美酒佳肴，又有钟鼓琴瑟之鸣奏助兴，汉代人享受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生态度令人神往。

毋相忘

“常富贵”蟠螭纹镜(图2)年代西汉，直径18.5厘米，重641克，铭文：“常富贵，言未当，长相思，毋相忘”。

西汉镜铭中有一类表达相思主题的铭文，如“长相思、毋相忘”“愿长相思、幸毋相忘”“泉愿永思而毋绝”等，情感哀怨缠绵，文意细腻精炼。这类铭辞自汉初面世以来，绵延约两百年。相思镜铭的产生与古代交通不便、国家对外用兵、百姓避灾避难等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相关。家是游子的归宿，亲人是旅者的牵挂。可以想见，身不由己的宦游人，养士、选士制度下驱使的士子，追逐利益的商家，常年戍边的征卒，远赴劳役的差夫，漂泊在外的流浪者……如此庞大的流动群体都做着同一个相思梦。而铜镜，在汉代逐渐由富贵大户走向普通人家。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映照之时，把玩之中，常常会使人产生“花好月圆”的联想，寄托着圆满、团圆、吉祥之意愿；同时作为一种工艺品，其纹饰、铭文也往往凝结着古代工匠的审美意趣。睹镜念亲人，铭文寄相思。

见日之光

“日光”四乳八枝草叶纹镜(图3)年代西汉，直径11.5厘米，重108克，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

草叶纹主要出现于西汉中期，尤其在武帝时期最为突出。存世的西汉草叶纹镜中，带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阳)”铭文的占极大比重。关于“见日之光”一句有两种解释：一为“见”同“现”，意为镜面光洁明亮如同日光。中国原始居民有着对日月的崇拜，在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出土的器物中都可以看到日月图样，而从汉镜“光辉象夫日月”铭文中也可得知当时的人们会将镜面比作太阳。二则来自《博雅》，“日”被解释为“君象也”，由此也可以将“见日之光”理解为明君君临天下，有如阳光普照大地。上述两种解释都反映了人们积极的期盼与愿望，前者是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与赞颂，可以理解为由秦末战乱后，人们对于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希望，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后者是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社会经济繁荣，国防巩固，人民对生活幸福的赞美，也是对汉武帝继承大业，推进盛世的肯定和称颂。

延年益寿

“铜华”单圈铭带纹镜(图4)年代西汉，直径17.6厘米，重728克，铭文：“漻(炼)治铜华，清而明之，以为铜，宜文章，以延年而益寿去不羊(祥)，与天毋极而日月之光兮”。

“铜华”意为铜料之精华，指质量极佳的青铜合金，铸造出了这面精美绝伦的铜镜。“文章”是铜镜铭文与纹饰的简称，意指镜背图案雕工华美精致。“去不羊”即去除不祥之意，古人认为铜镜具有辟邪的神秘力量，“辟除不羊”“镜辟不祥”即是对铜镜辟邪功能的描述。此类镜铭，不仅宣扬了铜镜材质精良、制作工艺精湛、具备优质实用功能，还表达了对持镜者吉祥、长寿的美好祝愿。

长保二亲宜子孙

“赵氏”五乳四神禽兽纹镜(图5)年代东汉，直径13厘米，重443克，铭文：“赵氏作竟(镜)世少有，男封侯女王妇，寿如金石，西王母长保二亲宜子孙兮”。

铜镜铭文“长保二亲宜侯王”“长保二亲乐毋事”“长保二亲生久”“长保二亲”等表达了铜镜铸造者和使用者对父母的祝福。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忠”“孝”观念尤其重要，在铜镜铭文中均有表现。《说文》云：“孝，善事父母者。”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铭文中“长保二亲得天力”就是孝道最朴实的表达。二千多年来，“忠”“孝”观念早已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组成。

多贺国家人民息

“李氏”六乳禽兽纹镜(图6)年代东汉，直径19.9厘米，重956克，铭文：“青盖李氏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皆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长保二亲。”

在汉代，无论是官方或私营铜镜铸造业都获得了重大发展，铜镜已发展成一般商品。镜铭也大大拓展了其涵盖的空间，其中，以推销自己为主要内容的广告铭文惹人瞩目。例如这面“李氏”镜，又称纪氏铭镜。由于私营铜镜铸造业的快速发展，相互竞争，纪氏铭应运而生，毕竟“老王卖瓜”，首先得让人知晓制作者。“李氏”“宋氏”“三羊”“青盖”随处可见，目的就是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扩大铜镜的销售额。看来，商品立字号的观念源远流长，从现今“王麻子”“张小泉”老字号的招牌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古之遗风。镜铭中“四夷”为少数民族的泛称，即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四夷服”镜铭主要出现于王莽时期，兴盛于东汉时期。“多贺国家人民息”表达了祝福国家繁荣、富足、太平的愿望。铭文内容体现了铸镜者希望四夷归服、国家太平、父母双亲长享其乐、夫妻恩爱、子孙绵延不绝，寿如金石、富贵昌乐、官位尊显的幸福追求。

古代铜镜是国家与民族的名片，其方寸之间，涵盖了人文国学与自然国学等诸多信息。中国铜镜是一种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特殊文物，其铸制历史连贯，考古断代便捷，文化内涵博大，审美情趣彰显，证史直观翔实，书体映照生辉。



图1-1



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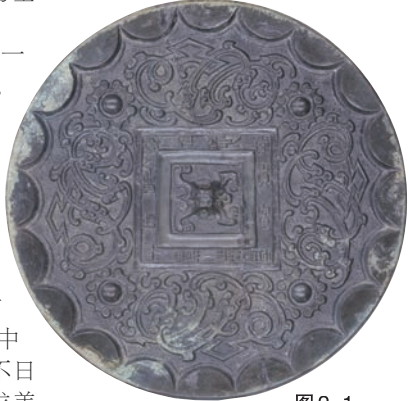


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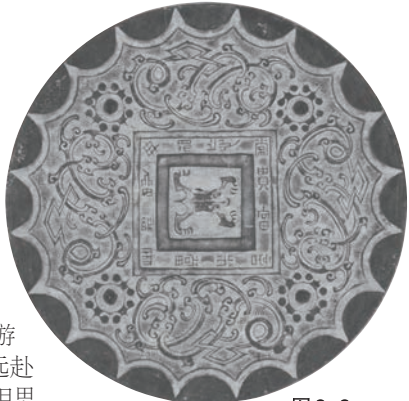


图2-2



图3



图4



图5-1



图5-2



图6

看砚铭之美与宋代文人趣味 从馆藏《西清砚谱》

赵文慧

历代撰述砚史的书籍，不下数十种，然而真正完整的砚谱撰述，却要宋代开始。欧阳修的《砚谱》，其内容虽然只有短短七百零余字，但记载了端石、歙石等各种石品的开采、色泽、砚材等资料。宋代唐询《砚录》、米芾《砚史》、李之彦《砚谱》等著述，对宋代文人所用的各种砚石做了翔实的记录。至明代，文人对砚石的论述，更是繁多，如曹昭《格古要论》中的《论古砚》，高濂《遵生八笺》中的《论研》等。清代，康熙乾隆三位皇帝皆勤学好书，砚石的著录以《西清砚谱》为冠。

衢州博物馆藏《西清砚谱》收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西清砚谱》编撰缘起，在清高宗乾隆帝中写道：“……内府砚颇多，或传自盛朝，或弃自国初，如晋玉闾堂砚、璧水暖砚，久陈之乾清宫东西暖阁，因思物繁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绘综序，以致遗失，为可惜也……”于是乾隆四十二年(1778)，清高宗命大学士于敏中等八人，将内府所存诸多藏砚精选二百方，加以说明及图绘而编成，并定名为《西清砚谱》。西清者，是官禁禁苑之地也，清代南书房，亦称西清，向来是朝臣翰林学士出勤之所。《西清砚谱》中的藏砚图绘部分，由内廷供奉门应兆负责，他以西洋光影法描绘，所以每件砚石的绘图均与实物极为神似。仅宋砚部分，就包括了歙砚、端砚等各种砚品，其中不乏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宋代文豪使用过的珍品。因而，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一窥宋代砚台之面貌，找寻他们背后的文化。

砚台有砚铭，砚铭是刻在砚底、砚头、砚盖、砚身四侧或者其他空余部分的一种可长可短，亦诗亦文，不拘一格的自由文体。相传早在商周时期，周武王就曾作砚铭“石墨着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东汉李尤《墨砚铭》云：“书契既造，墨砚乃陈。烟石附笔，以流以申。篇籍永垂，记志功勋。”徐铉《砚铭》云：“它山之石，是研是治，荆蓝表润，云雾含滋。”在唐代，更有诗人王嵩尊写《孔子石砚赋》：“昔夫子有石砚焉。避器用，宛无雕镂。古石犹在，今人尚传。叹叹兮何世，至获麟兮几年，世历近王霸，年止几几迁。任往回于几席，垂翰墨于韦编。时亦远矣，物亦在焉……”

天津博物馆藏 甲骨中的“兔”

张夏

天津博物馆收藏有1700余片甲骨，其中多有早期发现的甲骨珍品，一向以片大字多、字口清晰、内容重要而在学界享有盛誉。这批甲骨所刻契文，内容涉及商代祭祀、军事、内政、田猎、农业、畜牧、天文、气象、生育、疾病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2017年，包括天津博物馆在内的国内11家甲骨收藏单位联合申遗成功，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甲骨中，可以觉得从古至今陪伴人类的兔子的踪影。甲骨上的“兔”字无疑是天津博物馆所藏所有文物之中最早的“兔”字。本文着重介绍商代武丁时期的“乎多羌逐兔”卜骨(图1)。

这片卜骨纵23.8厘米，横14.1厘米，正面刻有6条长短不一的卜辞。头2条卜辞，均刻于三千多年前一月的某个己丑日，内容是占卜卜好是否会于第二天庚寅日分娩。而涉及“兔”的卜辞则刻于妇好“产期”的第二天，也就是辛卯日。占卜的内容是：“辛卯卜，咎，贞乎多羌逐兔，隹(獲)”，命令多羌去追逐野兔，是否能成功捕获。“兔”字位于整片甲骨的右下。

从甲骨文来看，商代许多职官名都带“多”字。如“多子”“多尹”“多君”“多生”“多工”“多犬”“多马”“多宁”“多万”“多食”“小多马羌臣”等等。这里的“多羌”与其说是商王手下的羌奴，似乎不如解释成商王手下负责管理羌奴的官吏更为稳妥。毕竟以商王地位之高，应不会直接向“底层办事员”下令。

卜辞中的“兔”可解释为“野兔”。“野”字并非随意加的，根据动物考古学家们的研究，虽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就多有兔子



图1 苏轼《从星砚》



图2 文天祥《玉带生砚》

亦人在焉……”

宋代的文人喜爱把砚铭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砚铭刻于砚台上，置于案前，时时劝勉自己要躬身力行。在宋代书画风格的影响下，宋代的砚铭广泛吸收了篆刻艺术的构图、章法以及刀法，使砚铭与篆刻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砚铭款识与前代相比更为普遍，出现了在砚铭后加盖印章的新内容。从此，款识成了砚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砚铭的装饰美。虽然形制较之后世不是很丰富，但却真正做到了“不雕不琢，抱素见朴”，这些与宋代的书画风格是相通的。

《西清砚谱》中收录的宋代文豪苏轼的藏砚“从星砚”(图1)，是砚台中的无价之宝。这方端石长方抄手式砚台，下端无堵，石色棕褐，有蕉白晕及微黄斑纹，砚面下斜至墨池，墨池中央下方有一石柱，以象征明月，周围以流云，砚背则满布长短不一、参差不齐的细长石柱，错落六十余柱，柱端面各有眼，象众星满布上天。砚石侧壁鐫行书铭：“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钤印一“子瞻”二字篆书，砚首壁鐫清高宗御铭：“天池一月印，空宇众星攒，燿火宁相比，陶泓永得完。依然北朝末，真出老坑端。清伴文房暇，摘辞慨染翰。”题款：“乾隆丁酉新春御题”，钤印二：“比德”“朗润”。这里，苏轼不仅把砚和中国的书法艺术相比较，进而涉及人生的态度。

作为文学形式的早期砚铭，大多是就砚说砚，是文人用以品评和赞美砚的。到了宋代，文人喜欢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同时作为座右铭体现主人的人生观或情趣。从这以后，言志寄情、赋诗颂词便成为砚铭创作的主流之一，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砚铭：“持坚守节，不磷不缁”，文天祥的砚铭“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都表达了坚贞不屈的精神。

《西清砚谱》中收录的文天祥玉带生砚(图2)，砚台器厚而上下圆，形状如同鞋履，

砚堂部分为椭圆形，墨池为半月形，因为砚台所采用的石质色彩呈纯紫色，砚台的侧壁中央环绕着白色的石英质石层一道，又因为这道石英质石层莹白如带状，所以砚首刻篆书“玉带生”三字。在这方砚台的砚壁沿白色玉带下方，环刻着文天祥砚铭，共38字：“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翩翩，中之藏兮渊渊，外之泽兮曰宣，呜呼！磨尔之心兮兮。庐陵文天祥制”。一方砚台，体现了文天祥坚贞爱国之心。

宋代文人在砚台上篆写砚铭时，是一种自我欣赏、自我激励，亦是在自我感伤……文豪苏轼流传下来的砚铭很多，并且都意味深长、富有哲理，反映出正直文人的情趣和抱负。苏轼《龙尾砚铭》：“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感叹砚台的美丽及高尚品质。他的《端砚铭》：“我友三益，取溪之石。与墨为人，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坚之液。匪以玩物，惟以观德。”以人物为鉴(镜)观德。他写给儿子苏迈的砚铭说：“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若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教育子孙为人、处事、治学之道，中肯且情深意切，包含了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希望之情。苏轼《王定国砚铭》：“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发剑，予以试(磨)墨。剑止一夫惊，墨以为万世则。吾以是知天下之材皆可纳圣贤之域。”大有众生平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味。他的《丹石砚铭》说：“形池紫渊，出日所浴；蒸为赤霓，以贯谷。是生斯珍，非石易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碧水环复。耕于中州，艺我玄粟。投种则收，不炊而熟。”“玄粟”把墨写的文字比作粮食，“艺”是栽种的意思，“投种则收，不炊而熟”，从中可以感受文人雅士的清气。

总而言之，一方小小的砚台，寄托了宋代文人太多的理想，砚的背后，是他们或许精彩或许无奈的人生。砚台与文人同悲欢，随文人共荣辱。对于宋代的文人来说，砚台不仅仅是书桌案上的一件普通的文房用具，从某种意义上说，砚台已经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感、表达志趣的艺术品。



图3 商周文字中的一些“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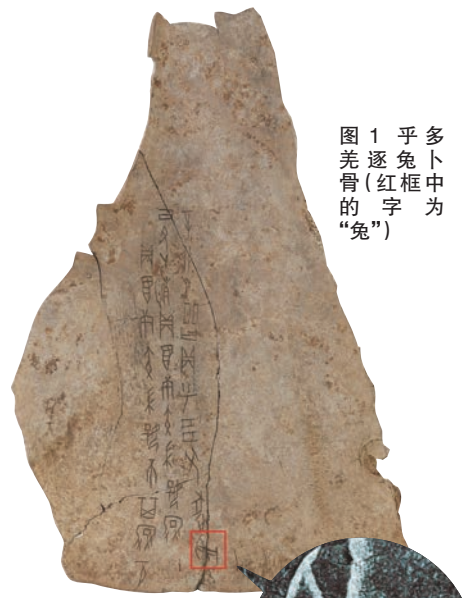


图1 乎多羌逐兔卜骨(红框中的字为“兔”)

图2 乎多羌逐兔卜骨拓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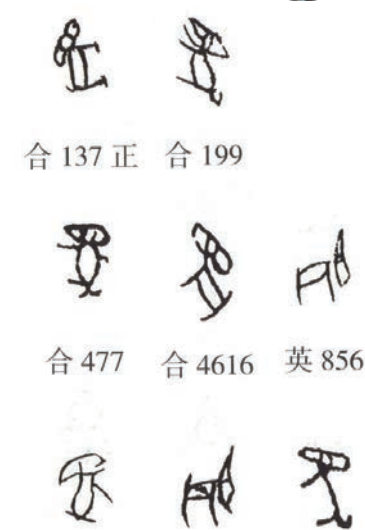


图4 甲骨文中的“兔”字